请你经常敲敲门

徐少平

前不久，我们附近一个小区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。一位70多岁的老教师突然离世。老人身体一向还行，就是爱静不爱动，也少有朋友走动。他爱人长期在南京带孙子，家人联系也不多。那天同在一城市的妹妹打电话给他，早上、晚上都没人接，第二天一早还是没人接。妹妹预感到情况不妙，连忙乘公交过来。家里灯还亮着，手机在屋里响着，就是没人接。她请邻居搬来梯子，翻院墙进入，发现哥哥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早已没气息了。公安人员验尸后，排除他杀，结论是心肌梗塞。

邻居们议论纷纷，老人怎么不出来走走呢？家人怎么不经常打电话问问呢？还有的说，我们邻居也有责任，应该经常关心关心。

是的，如果有人经常敲敲门、打打岔，很可能会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。

这也让我想起前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。

我的楼下是位独居老人，姓杨，腿脚不便，和我同样订了份晚报。一次我要出去旅游一周，邮箱里的晚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老杨不是每天收取报纸吗？不如请他代收。于是我敲响了老杨的门，初来乍到，寒暄几句，我便不好意思地说明来意，还怕老人不愿意呢，哪知他连连点头，“没问题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一定收着，等你回来给送去。”接着，老杨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也想请你帮忙一件事。”

边看边聊

原来他老伴去世多年了，儿子在日本定居。儿子也邀他去过，他在日本住了几天，总觉得不自在，而且整天闷在家里像坐牢似的，度日如年，不几天便回来了。老人动情地说：“还是在国内安心、安全，在家乡舒畅、自在。邻居好，赛金宝，看你也是个慈善之人，想请你经常敲敲我的门，我耳朵还行。哪怕每周一次。可以吗？”

这太简单了！我也没有犹豫，立即答应：“行行，经常敲门，看看你，你需要什么头一天微信告诉我，我有空替你办。”老人如释重负，千恩万谢。

其实对我来说，敲门真的是举手之劳。有空敲敲门，问候几句，于人于己都是件快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以后我隔三差五敲敲老人的门，有时顺带送上报纸，有时按他前一天的微信带点菜。每次去，老人都非常热情，坚持给我泡杯茶。一杯茶，半杯茶叶，不光有铁观音、普洱，还有日本的什么宇治茶、日本红茶。我说：“我喝茶，茶叶只放几片。”“几片？这不淡如水吗？”我哈哈大笑：“君子之交嘛。”但每次老人还是放不少茶叶，我都要喝到茶味寡淡，才带着满口余香离去。

一年快过去了，一天下午老人突然敲响我的门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兄弟，我儿子让我住敬老院，现在就准备走了。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关照，以后不麻烦你敲门了。”

不就是敲敲门吗？我有什么麻烦，倒是品尝了你不少高档的茶叶呢。

在儿子的搀扶下，老人高高兴兴地坐上了敬老院接送的车子，向我挥挥手道别。

望着渐行渐远的老人，我不知是喜还是忧。

是啊，每个老人都会乘上这趟车，走上永不回程的旅程的。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只能默默地遥祝老人们一路平安，顺风到站！

岳阳路的那盏明灯

远方

岳阳路，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一条小马路，总长不及千米。

岳阳路的地标建筑，是北端的普希金花园。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头颅，一年四季始终高昂着眼望远方。不过更多时候，我会选择自南向北走。经过中国画院，有时运气好会遇见卖花人。见你上前也不招呼，一辆堆满鲜花的自行车静静停在身旁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带上一束精挑细选的鲜花，拐进前方的小弄堂，去草婴先生家登门造访。

草婴，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。可叹余生也晚，登门拜谒的时候，草婴先生已经长住在华东医院，不复往昔的健康。每次接待我的，是他的夫人，亲切的盛天民老师。而和盛老师结缘，是通过另一位可敬的老人，薛范老师——歌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译配者。

2014年的早春，一次行业内的读书分享会上，一个小伙伴推荐了《草婴传》，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了不起的翻译家。活动结束前，我作为召集人突发奇想，让同伴们集体签名在一张贺卡上，祝先生健康。贺卡写完了，由薛范老师交翻译家协会转递过去。时间一晃到了初夏。薛范老师在社区举办一场苏联老电影《一个人的遭遇》的赏析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我为薛老师奉上了一捧鲜花。没想到下台来，旁边一位老者凑到我近前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束花送得很好，不过你知道吗，今天的台下，还有一位更值得你送花。”那天下午，是我第一次与盛天民老师相遇。

“欢迎你来岳阳路做客。我有一本书想送给你。”

第二次见面，是在一个微风的夏日午后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近岳阳路。两旁的梧桐树叶，和着微风沙沙地响着，仿佛在笑我的拘束。

“草婴没力气签名了。这本书刚刚盖好了章，你看的时候当心一点。”盛老师把一张小小的餐巾纸，小心翼翼地垫在扉页之上，笑眯眯地将书递给了我。“欢迎你再来。”

走在回家路上，我右手紧紧夹着这本蓝色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梧桐树叶仍然沙沙地响着，脚步，却随着微风轻快了起来。

自此之后，我成了岳阳路的常客。每次迎接我的，总是盛老师温暖亲切的笑容。在那里，我才真正沉浸在托尔斯泰的世界，惭愧自己早先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是多么浅薄。人到中年，我却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，找回了对书的热爱。听盛老师讲过去的事，聊她与草婴的心愿，谈年轻人的理想，慢慢的，我的心灵如同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。

在盛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下，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。无论刮风下雨，高龄的她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活动现场，为我打气。在普希金的铜像前，我们纵情地朗诵自由的诗句；在黄浦江畔，深情朗诵莱蒙托夫的文章。她是草婴先生的影子，春风化雨般教导我，如同百多年前的托尔斯泰，在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，用文字传递着力量。

五年的时间匆匆而过。2015年秋天，93岁的草婴先生走了。2018年的夏天，90岁的盛老师也离去了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呼吸就困难起来，心仿佛被瞬间抽离了一部分。十九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一句话：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总想，会过去的，想一想，雅斯纳亚·波良纳还有托尔斯泰在呢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，我的明灯呢？都不在了。每念及此，不禁泪目。

2017年冬，草婴外国文学教育基金成立。2019年的春天，草婴书房建成，草婴“留一块墓碑，不如留一间书房”的愿望得以实现。2019年夏天，草婴文集问世。一眨眼，时间又到了晚秋，这个桂花不再飘香的时节。

“远方，你来办一个读书会吧。等草婴书房建成了，后面的活动，就拜托给你了。”

梦里，我又回到了岳阳路上那幢精致的小楼，坐在温暖的客厅沙发上。对面，依旧是盛老师亲切的笑脸。墙头，草婴先生还是笑眯眯地望着我们。桌上，一杯香茶呼呼地冒着热气。

“可是，可是，现在年轻人都不读书了……”我喃喃道。“我不知道，我做不好。你们都走了，我，我……”

盛老师站起身，坐到我身边，拉起我的手，轻拍着说道：“我们不在了，书还在呢。”

“你很好，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可以的。”她又鼓励着我，一如往常那样。“记得，书还在呢。一定有爱书的人，会的。”

梦，醒了。音，犹在。是的，书还在呢。

走走口罩

我高一的数学老师就坐在我对面，我是通过他认识他儿子的。1994年我高一，那时上海还没有地铁。第一条地铁1号线是1995年4月10日正式运营的。高中那些日子里，我沉默寡言，蘑菇头，和现在差不多高。数学老师在自修课上看守着我们，总是一副瞌睡的神态。他儿子那时不在我们班，但串起教室来自然大方。有一次，男孩十分怜悯地看着我解题，突然说，我来。然后洋洋洒洒，这给了我一种智力上的逼迫感。他最喜欢做证明题，细细分解，好像那样才能理解事物，到达根本。我问他，你将来想干什么。他说，不会和学校里那些男老师一样，他只想随便干些什么。那年我们才16岁，他却用了“四处漂泊”这个词。我想走遍全中国，有什么活就干什么，我爸爸说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可你爸爸选择了做我们的老师，还以此为终身职业。接着他把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爸爸的个人生活全都讲给我听。那时我就明白，越了解一个人，越会像剥洋葱一样，对方形象在你心中，变得越来越小。

我上班的地方在陕西南路附近，1号线、10号线都可以到。我就是这样在拥挤的早上碰到了我高一的数学老师。我没认出他，但他把我认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在陕西南路站下了车，一起喝了杯咖啡。

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，数学老师说，最近他在卖一种口罩，挨家挨户。在北京吗？我问。空气里都是小颗粒，戴上它，您的肺保证干净。他就这么卖口罩。他结婚了吗？我问。他有个老婆，她常常要去医院，身体不好，但他们不住在一起。

他儿子长得很好看，嗓音也柔和得恰到好处，他可以把口罩卖给每一个人。就在那时数学老师喝完了咖啡，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吧，他对我笑了笑，起身离开了。

事情总是这样的。都分手了，然后有人告诉你，你们俩，应该在一起，而不是和那位某某某。

我从未和他儿子联系过。

有一天，我在上海街头看到几个老外发口罩，我就穿到路对面去了。我不想受到一只口罩的影响，比如说，类似蝴蝶效应。口罩让你过滤真实世界。要知道，一个数学系毕业的“211”本科生，一个喜欢读历史书，喜欢用图表分析世界的人，也许真的，再也找不到其他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。

高考前一天，我偷偷离开家，坐公共汽车去了他家。我碰到了我高一的数学老师。他对我点点头，你是我教过那个班的。他居然伸出手来与我握手。而他儿子，在送我去车站的路上握住我的手说，不要怕，你会考上的。

四处漂泊的时候，要为我写日记啊。你也是，要写下自己的思考。我们买了一模一样的笔记本，有皮封面、皮底。其实每天坐地铁，也是在四处游逛。地铁车厢，就和口罩一样。它们都不在你的生活里，却和你的生活，保持平行。

夏日回忆 张逸 摄

七夕会

清香袅袅桂花粥

刘向东

又到了桂花盛开的日子，那四处飘逸的桂花清香又勾起了我对桂花美食的向往，也让我想起了与它有关的一段往事……

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，我与师傅乘长途汽车去浙江东南的苍南县山区执行追捕任务。途中我因感冒发烧而不得不在楠溪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暂时停留。天色渐晚，村里的治保主任老张热情地邀请我们夜宿其家。他家在一片竹海掩映的山脚下，一条清亮的溪水从门前潺潺流过，竹篱笆围绕的院子里桂树浓郁，馨香弥漫。晚饭前，老张为我找了两片退热的安乃近后，又从桂花树上摘了些桂花，让老伴用新收的大米为我熬了两大碗香气袅袅的桂花粥。也许是药和粥的合力作用，翌日一早起来就病好如初，神清气爽。临别时，老张还送我一包晒干的桂花和一袋山里的蕨菜干，说这些桂花用来泡茶泡酒或熬粥可香着呢！

回到家里，我如法炮制，可试了几次就是做不出老张家的那种色味，于是请教母亲。母亲笑笑说：要做好桂花粥，关键是把握火候和稀稠度。太稠了桂花会黏糊在一起，太稀了桂花又显得琐碎轻浮。最要紧的，无论是鲜桂花，还是干桂花，都不能过早入锅，否则就被煮烂而无花色。大米和水一般是1比7的比例。等大米绽开米花，汤面浮起米油而略显微稠时即放入桂花，过一两分钟即可出锅。这样的粥稀稠适中，细腻滑润，均匀荡漾的朵朵桂花金黄鲜亮，花香悠然。母亲还说，秋天气候干燥，容易秋燥犯病，而桂花粥却是制作方便、开胃爽口、祛火润燥的一道美食。如果再放些山药、枸杞、红枣和花生、莲子，就成了一道保健美食了。

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很快学会了做桂花粥，每至丹桂飘香时也总会趁季采摘些鲜桂花熬粥。桂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，又是十分实用的食物添加品，还可泡茶、泡酒，做桂花糖藕、桂花鸭、桂花糕和汤圆……有散瘀破结、疏肝理气等食疗功效。所以，人们向来喜欢用桂花点缀美食，还想象出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的古老神话，也诞生了诗人屈原那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”的美丽意境。

前些日子，我工作繁忙，身心疲惫。心有灵犀的母亲找了些新鲜桂花，每天一早就做好桂花粥。我起来一见到青花碗里那温润亮泽、清香缭绕的粥就食欲大增。有时母亲还会给我泡上一杯桂花茶悄悄地放在我的书桌上。看书累了，轻啜一口便是浅浅淡淡的桂花香，偶尔有几朵花儿入口也是满口留香。那些沉沉浮浮的心事和疲惫便在这悠长清朗的桂香中，缓缓落定。

美食

穿越时光的温暖

夏江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唐古拉山下的一个邮电局从事报务工作。当时传统的无线电台拍发电报，曾是西藏通讯的主要方式。我每天在一间白铁皮屋顶、干打垒筑墙的房间里“滴滴答答”地收发电报，有时业务量大，一天下来，眼睛里全是电报码，耳朵“嗡嗡”响。

那时，人们的工资一二百元，发电报是按字收费，每个字收费0.135元，标点符号也算一个字，所以发电报的人惜字如金，私人电报常见的电文为“家有急事速归”（没标点）。

有一年十月底，天沉凝冷，雪盖大地。我正在营业室拿拍发的电报，突然推门进来一位身穿驼色羽绒服、年近三十岁的女人。她双眼浮肿，面容憔悴，左臂用纱布吊在胸前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要打长途电话。”营业员告诉她，因雪大电话线路中断正在抢修，只能发电报。她又焦急地问：“那给那曲发电报什么时间能收到？”我连忙说：“下午四点左右吧！”营业员拿了一张电报纸让她填，她拿着笔，久久地看着电报纸自言自语：“我怎么向娃他爸交待？可怜的娃呀……”随即趴在营业柜台恸哭。我们连忙劝慰，询问后才得知，她丈夫在那曲工作，因为工作忙，已三年多没休假了，十分想念八岁的儿子。所以她专此带着儿子从陕西老家进藏，想满足娃他爸的心愿。谁知因雪大路滑，搭乘的东风卡车在唐古拉山下翻车，司机重伤，她左臂骨折，娃的头部受伤淤血。等孩子在当地医院手术后，她匆忙赶来打电话向丈夫报急。

下午我首先将这份“车翻儿危速来安多医院梅”的加急电报发出。在拍发这11个字的电码时，我指僵腕沉，脑里闪幻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朝着满脸是血的男孩扑去相拥亲吻的画面。我暗自祈祷那个男孩能转危为安。而我敲击电键的电波声，就像孩子的父亲期盼见到可爱儿子的眼神一样，刺向雪域高原的天空，射向远方。

几年后，电报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我也调到藏北一个地区邮电局从事行政工作。上世纪90年代初那曲地面卫星接收站建成后，有一天我给远在苏中家乡的妈妈打电话，妈妈带着我年幼的女儿骑了十多分钟自行车，在当地邮电局营业厅等了半个小时（因通话信道少总掉话），终于和我通上话。当女儿幼稚的童音隔着千山万水叫着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！……”我既感到幸福，又感到揪心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，我经历了西藏邮电行业的每一次体制改革，使用的通讯工具也从最初BP机、大哥大，2G时代直板机、翻盖机，3G时代的半触屏手机，到现如今的高清大屏智能4G+手机。可以说手机已成为我工作、生活、社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前不久，曾在藏北共事的藏族朋友和远在苏中家乡的我通过手机视频通话，当手机屏上出现千里之外藏族朋友一家欣喜的笑容，不知怎么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那焦急如焚发电报的那位中年妇女。我不知道那对父子是否相见了？那个孩子是否平安长大了？但女儿当年期盼我回去的动听童音，至今会在脑海回响。那是我燃情岁月与雪域高原的通信发展相联的人生轨迹，是穿越时光的温暖记忆。